

## 中国当代作家论(第二辑)

## 《陈映真论》(任相梅)

陈映真在战后的台湾独树一帜,他的文学不局限于“乡土”,不卖弄“现代”,而是始终基于人性,基于对“人”的终极关怀,用艺术手法挖掘社会现实,表达个人的思想与见解。毋庸置疑,陈映真是思想型的作家,他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是在为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找答案,或是在寻求足以指导人生的理念。他的小说让我们得以从大历史的变局与微小个人的命运关联之处,去思索台湾战后的历史,理解作为中国历史的有机部分,也是一独特部分的台湾当代史的命运。

## 《韩东论》(张元珂)

作为新诗艺的实践者,韩东除旧布新,开一代诗风的探索与实践,对“第三代诗人”的影响是内在而深远的。而且,其影响不仅限于诗歌界,还影响到了小说界,可以说,90年代后期出现的“新生代小说”是对以韩东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诗歌精神的延续。这不禁让人想起了20世纪初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三大主义”,虽就其影响力而言,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不能与之比肩,但其“文学革命”的逻辑及推动“新时期文学”向前发展的客观效果则是极其相似的。

## 《刘恒论》(李莉)

刘恒是作为“新写实”作家引起人们关注并进入文坛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等作品引发了热烈反响。30年后的今天,回头看



这类在标题上惹人注目、在内容和技法上突破传统规约的作品仍有一定的冲击力。如果拨开那些在当初看来颇为“火辣”的字眼和词句,从叙事方法和叙事技巧等方面衡量,刘恒采用的仍然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通过一套富有新意的话语系统有条不紊地叙述着自己设想的故事。他在循规蹈矩中又有破“规”创新,有些文本因为其“贴地”的现实性更显生活气息。

## 《苏童论》(张学昕)

苏童是当代中国为数寥寥的具有鲜明唯美气质的小说家之一。无论其所表现的阴森瑰丽、颓靡感伤的人事风物、历史传奇,还是精

致诡谲的文字和神秘意象、结构形式,无不呈现着叙述的精妙与工整,散发出韵味无穷、寓言深重的美学风气。我们说,唯美的,不一定是颓艳的,不就是伤感、放纵的,但一定是诗意的。苏童就是更多地从个人记忆、个人生命内在体验方面想象生活、进行心灵创造的小说家。他讲究叙事技术,风格摇曳多姿,而且擅长将记忆中的经验或生活诗意化,他的叙述常常引导读者离开日常生活,努力地进入一种更高的艺术真实,使叙述与我们的内在感受息息相关。

## 《于坚论》(霍俊明)

于坚诗歌中无处不在的是场

景、事物、物象、细节,“回到常识走向事物本身”。这些客观之物经过诗人在场式的写作风格,即使于坚所处理的历史化的题材也是建立于个体感受和日常情境之中,尤其是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使得个人与现实和历史形成了交互性结构一历史的个人化和个人化的历史。

## 《张炜论》(赵月斌)

张炜始终是一个想到月亮上行走的梦想家。他拼力创造一派旷世弘言,着意成为一名天真诗人,表现在文字上除了鼓吹崇高正义美德善行,渲染香花芳草浪漫诗情,更有其阴柔内敛、蜷气氤氲的神秘气象。一般而言,人们习惯于把张炜归类于所谓现实主义作家。以《古船》《九月寓言》等名作为代表的仿宏大叙事、民间叙事似乎只有一种扑向地面的解读方式,张炜常常被概念化为忠于现实、热衷说教的保守派作家。奇怪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实张炜本质上原是凌空高蹈的,在被定义为大地守夜人的时候,岂不知他正将目光投向高远莫测的天空。

## 《二月河论》(郝敬波)

作者以充满怀念、深沉的笔调,回顾了作家二月河的文学创作生涯,试图以更宏观的视角,在广阔的文学领域内,客观看待与思考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创作艺术,以多文本相比较及重点文本细读的法则,为二月河在中国当代文学进程中找到准确位置。

提到曹文轩,已经是一位不需要任何注释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2016年,曹文轩成为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他的《草房子》《青铜葵花》等更是深入人心,成为辨识曹文轩创作风格的典范之作。曹文轩作品的乡土与古典,苦难与悲悯,伴随获奖的聚焦进一步得到彰显。然而,这一标识,似乎有日渐“定格”之感。事实上,曹文轩的创作已有着30余年的积淀与异常丰富的样貌。这30余年的创作,记录着曹文轩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探索,至当代走向世界的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突破的锐气与实绩,呈现着不同时期的、极富创新性的儿童文学作品。相较于被彰显的长篇小说的艺术气质,曹文轩作品中旷达宏大的幻想题材,现代都市的幽默书写,各异群体的儿童塑造,四两拨千斤的童话小品等,似乎如“日晕效应”般被遮掩了。

作家出版社“曹文轩小经典”系列丛书由曹文轩亲自编选,选文纵跨30余年,涵盖长篇、中篇、短篇、现实题材、幻想题材,乡土题材、都市题材,小说、童话等多个维度,汇聚而成《孤独之旅》《水薄荷》《鸭宝河》《芦花鞋》《外婆树》典丽素朴的五卷本。长篇小说的节选,源自《草房子》《青铜葵花》《根鸟》《山羊不吃天堂草》“丁丁当当”系列,“大王书”系列,“皮卡兄弟”系列等作品中的经典段落。大量极为优秀的短篇小说也藉此次“小经典”得以集结,既有曹文轩较早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又有取自新近的“萌萌鸟”等桥梁书与《羽毛》等优秀图画书文本。

相较于现实题材,曹文轩的幻想类儿童文学创作样貌也极为丰富,多部作品均以幻想之翼突破现实之维,诠释了作家对“幻想”基于文学的意义理解。在西方魔法幻想席卷中国的21世纪初,曹文轩以长篇幻想小说《大王书》为载体,对本土幻想小说的美学格局做出了架构性的努力。“小经典”中,《公石头母石头》等篇选自《大王书》,《黄琉璃》,《水薄荷》与《坡》等篇选自《大王书·红纱灯》。“大王书”展现了曹文轩惊人的想象能力,故事架构雄奇连绵,格局寥廓旷远。从地狱逃出的“熄”篡夺王位,焚书愚民。一本奇书“大王书”却飞出火焰,寻找到牧羊少年“茫”做自己的主人。茫被拥立为王,带领军队与熄开战。大王书不但改变了茫的命运,见证了茫的成长,更是冥冥中“正义”与“理想”的化身。作品中的茫、熄、猕等虽然都出自幻想,却塑造得性格鲜明,极富质感。这部幻想作品中,作家用了四分之一的笔力来写景,融情于景,独特的遣词造句营造出极独特的意境。富有气势的比喻,宏大的景物描写,强烈的画面感,构成一种作用于耳目的冲击力。作家将主体的感觉赋形,人物所见所感之景渗入了强烈的主体意识,主客交融,动人心魄。作品呈现出中国古典浪漫主义的诗学气韵,如盛唐诗歌般写意、挥洒,意境阔达。“大王书”系列中,曹文轩以自己的创作阐释着他对本土幻想文学创作的标准与去向的理解,凸显了“幻想”文学在故事之外的“文学”之意。

以“幻”写“奇”的同时,曹文轩的幻想还力图以“幻”求“真”。在他的多部童话、小品中,幻想手法常常是以承载哲思的小舟,以轻灵切入厚重。《外婆树》一册所辑,都是曹文轩的小短篇,千余字间讲述一个圆融的故事。《娃娃们的起义》以新异的幻想,将深切的生命感受赋予布娃娃身上,讲述一群被认定为残次品的布娃娃的命运抗争,也由此引出了一系列人类生命的命题,微言大义,内涵丰富。《痴鸡》同样是个令人动容的故事,讲人类的专横。《发条鼠》面临的,是新与旧的时代更迭,发条鼠的选择是以“忠诚”对抗命运的“无奈”,达成生命的“无愧”。《罗圈腿的小猎狗》则更为鲜明地体现出与命运抗争的意蕴。《柏林上空的伞》描绘一把心怀梦想且不留遗憾的伞,人生也许正当如此。有些故事,朝向寻找“自我”的归属。《飞翔的鸟窝》中,失去主人的鸟窝挣脱被动的命运飞了起来,开启寻找之旅。《最后一只豹子》中,一只野豹子终其一生寻找同类,寓意了思想者的烦恼与深重的孤独感。有些故事,则于命运中道出一种通透。比如《羽毛》,羽毛不断地寻找对自我的确认,产生了各种富于光环的假想。而在一次次询问中,一次次近距离地接触荣光、美丽、威猛的过程中,羽毛反而参悟了人生,悦纳了欢喜自在的生活。

曹文轩的幻想故事常常是“向内转”的,讲述心性,讲述孤独,讲述爱。《风哥哥》以丰富的层次讲述挚爱的失去与寻找。《菊花娃娃》《外婆树》讲暖心的报恩。《停不下的毛毛》中,作家感叹人生中的许多不完美,又从这些不完美中析出情感率性的温度。《鸟和冰山的故事》中,同样讲述浓浓的情感,相互的体恤,结局虽然均呈现为一种残缺的、遗憾的美,但又着实闪耀着珍贵的、相互给予的至善之光。这些借助幻想展开的小故事,并不仅仅作为故事存在,而是传达着某种命运之思,散发着热烈的、理想的光芒。

曹文轩的“儿童”书写是多姿多彩的,呈现着各样儿童的各色童年。他取材于当下都市生活的儿童小说,相较于诗意的乡土书写是毫不逊色的。“小经典”中所收《八哥》《草环》等故事,节选自现代都市题材儿童小说“皮卡兄弟”系列。作品以自然而松弛的“幽默”笔调,讲述城市男孩“皮卡”的童年,逼真再现了小男孩阶段性的心理成长。作家完全以童心入角色,皮卡对任何人、任何事、甚至一只鸟,都报以一腔不屈不挠的真情付出。真挚的童心世界,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的细节呈现,成人与儿童善意“对峙”的诙谐场景,呈现了儿童与成人面对同一世界的不同“打开方式”。《会说

## 被「彰显」与被「掩盖」

——由「曹文轩小经典」重读多维「曹文轩」□崔昕平

话的铃铛”则是曹文轩“丁丁当当”系列开篇的故事。该系列的创作极具难度。作家以丁丁和当当两个弱智男孩为主角,描写他们的到来与他们艰辛的生存。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有限制的人物视角下,丁丁和当当的存在与际遇,常常成为人性的镜子与心灵的试金石。在极致的悲剧面前,我们看到了生命内里那股坚韧顽强的力量。奶奶,傻傻的兄弟俩,以弱者的形象倔强地与命运抗争。“相依为命”的情感维系,直入人心的善恶描写,于悲剧中升腾起炽热的生命之气。

曹文轩曾在上世纪80年代撰文分析儿童文学显得“小气、拘束”的原因(《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小经典”所辑短篇,显示了曹文轩突围性的创作理念,题材样貌极为丰富。《小尾巴》中所塑造的小女孩“珍珠”,是妈妈甩不掉的“小尾巴”。通过一场惊悚的“走失”,作家穿透了这重看似牢不可破的壳呢,也敏锐捕捉了孩子奇妙的成长,极具典型性。《六十六道弯》落笔于城乡文明碰撞中的孩子;三个对乡间游戏心满意足的好朋友,被一群突然闯入的城市滑板少年



勾去了心魂。鹰滑板追风,成为三个孩子共同的梦想。作品细腻描写少年在山路滑行的画面,红透的枫叶随风坠落,少年脚踏滑板如鹰滑翔。如此美好,正是梦想的味道。《鸭宝河》中的鸭宝,心眼儿“透亮得像玻璃做的”。作家描写这份美善遭到的调侃与不齿,也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开启面向人心的询问。《第五只轮子》:天黑了,这回家了》则塑造了一些无辜地沦为“多余人”的孩子。前者是一个被醉汉捡到、遭村人厌弃的孩子,后者则因为父母的婚姻矛盾而陷入亲情的“缺失”。作家心怀悲悯,将他们的生存状态小心翼翼地捧出,描绘心无芥蒂的孩子怎样遭遇冷暴力,又怎样于被孤立的绝望中显露心底不泯的善意与温暖的渴求。曹文轩笔下,描写了各种原因导致的、滋味各异的孤独。但在讲述孤独的同时,不是怨怒,而是升腾一个层次,讲述深陷孤独、孤立、种种生存困境中的不吝的“给予”,与他的幻想作品一样,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

## 三

“小经典”中,还有几篇源自曹文轩普及度极高的经典长篇。《孤独之旅》选自《草房子》,《芦花鞋》《冰项链》选自《青铜葵花》,《吼唱》是《山羊不吃天堂草》中的片段,《树上的叶子就是我的家》选自《细米》,《青塔》选自《根鸟》。这些节选段落,常常并非矛盾冲突最激烈的情节,而是切近于文学的“诗意”表达。《芦花鞋》是一个如同散文诗般的段落。故事的推进被暂时搁置,作家以白描的笔法,展现一家人一起动手编织芦花鞋的劳作场景。他们凭借自己的劳作,勾画着未来的希望,等将“所有的”鞋都卖出去,就到镇上的照相馆照一张“体体面面”的全家福。这看似不实用的愿望,映出一家人对未来生活不灭的热情。《冰项链》也是《青铜葵花》中一个极其唯美的段落。作品不吝以细腻多姿的文字,展现生活中诗意的细节,展现人物不竭的、对生活之美的追寻之心。局促生活中仍满怀向美的心愿,是曹文轩穿越苦难,传递给今天小读者的精神养分。《孤独之旅》生动的“故事流”中,闪亮的景物描写烘托出油麻地四时晨昏之美。在油麻地的美丽风景中,一群生活活虎、赤诚相见的孩子们嬉戏、成长的画面,浸润着生活的质感。《树上的叶子就是我的家》中,极具艺术敏感与天赋的细米与梅纹分享“稻香渡”夜色下的瞬息变幻的美景,精致唯美,梦幻迷离。

这些被归入“苦难”叙事的孩子形象,曹文轩笔下写来,却不是悲剧的调子,而是努力于艰难中展现有态度的生活与有温度的人性。青铜与葵花困苦生活中不渝的兄妹情,因杜小康的家庭变故瞬间“尽释前嫌”的桑桑,富有时卓尔不群,贫穷后亦能不卑不亢的杜小康,在挣扎打拼中坚守人格“底线”的明子,都是那样的坦荡而富有光彩。作品中,作家屡次用“干干净净”这个词来描绘他笔下的人物。干干净净,是曹文轩作品的美学追求,也是曹文轩作品对生命态度的诠释,不求耀眼奢华,但要干干净净,内敛自律而有尊严。

高洪波曾以“三优加一”概括曹文轩的创作,“优雅”的写作姿态、“优美的语言风格”“优雅”的审美情怀,“幽默”的笔调,“堪称巧妙而全面”。借助作家出版社这套“曹文轩小经典”,曹文轩多年来、多个维度的儿童文学创作,被彰显的与被掩盖的,均得以穿越时间与版本的束缚,得到更加全面、立体的“重读”。

## 扶贫攻坚中的桂西北叙事

——兼谈桂西北作家近期的扶贫题材小说创作 □黎学锐

桂西北位于广西西北地区、云贵高原南麓,其区域范围为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划中的河池市。这一带以喀斯特地貌为主,石山连绵,峰丛林立,山势很高大,属于全石山地区,素有“石山王国”之称。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桂西北又被称为“广西的西伯利亚”,在地域组成上被戏称为“边角废料”。桂西北是多民族聚居地,这片土地有着自己奇异的自然地理特征及丰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奔腾咆哮的河流,荒莽险峻的大山,云遮雾掩的村寨,再加上热能丰富、雨量充沛的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使得桂西北世居民族形成了相对独立自主的与当地自然环境相协调的生产生活习惯,并逐渐孕育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与外界文化有所差异的桂西北地域民族文化传统。桂西北风华毓秀的山水意蕴和淳朴悠久的民俗风情孕育出了一个在广西文坛乃至全国文坛都颇负盛名的桂西北作家群。桂西北作家群作为广西文学创作队伍的主力军,近年来在小说、散文、诗歌等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成就,撑起了广西文学欣欣向荣的景象。

因为生长于山高壑深、偏僻贫瘠的环境中,少年时期尝尽生活苦难的桂西北作家们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大都采用“苦难叙事”的创作手法,去营造作品中的苦难意境。但是桂西北贫瘠的地理环境没有压垮作家们的人格,反而在他们内心深处酝酿出火一样的热情,并由此激发出一种战天斗地的奋斗精神。比如都安瑶族自治县的“雄心征服千层岭,壮志压倒万重山”口号,就是桂西北人民这种奋斗精神的绝佳概括。如果说,恶劣自然环境所催生的苦难意境是作家们对于命运的不甘或对现实不公平的呐喊,那么,奋斗精神就是作家们对于命运的坚定反抗,是改天换日的英雄主义梦想在作品中的升腾,充满震撼山岳的豪迈气概。这种苦难意境的营造与奋斗精神的书写,在桂西北作家们与扶贫相关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多年来一直是扶贫攻坚主战场的桂西北,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扶贫攻坚战线上的英雄人物和英勇事迹。比如20年前的1999年1月2日,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兴乡骨龙村党支部书记王任光就因为带领群众修路而不慎跌下悬崖殉职,年仅41岁。当时的桂西北作家们就纷纷以王任光的感人事迹为材料,创作了不少经典的文艺作品。同为都安籍的时任广西文联主席蓝怀昌与冯艺合作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云山朗月》;罗城籍的时任广西戏剧家协会主席的常剑钧等编创了大型彩调剧《大山小村官》;此外,以王任光事迹为素材的电视剧《苦楝树开花的季节》,获得了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工程”奖及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骏马奖”一等奖。

直到十多年后,同为都安籍的潘红日为完成中篇小说《报道》,仍旧多次前往骨龙村采访王任光家属及生前同事,捕捉创作素材。这篇小



说发表于2014年第7期《小说月报·原创版》,很快被2014年第8期的《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头条转载。小说写了贫困村修路难的处境,主人公老跛和小儿都因修路而死,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扶贫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一年多后,在精准扶贫嘹亮号角的召唤之下,作为河池市文联主席的潘红日以三个“最”(年龄最大、资历最老、级别最高)身份前往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通过亲身体会完成了长篇小说《驻村笔记》(作家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2019年11月,这部小说获得了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与《报道》中主人公老跛的名字一样,《驻村笔记》中红山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韦鸣炮的外号也叫老跛,这应该是作者对于处于扶贫攻坚战场最前沿的基层干部的致敬。小说以市文联主席毛志平带领的精准扶贫攻坚第七小分队为视角展开,围绕红山村架桥修路的矛盾冲突推进。在小说中,当下精准扶贫攻坚战中各式各样酸甜苦辣的场景都得以原汁原味地展现。当然,作者并不仅仅停留于展现扶贫生活、反映社会现实的层面,而是直面扶贫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深层矛盾,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批判,既写出了扶贫干部在面对“形式主义”“痕迹主义”时的艰辛与无奈,也刻画了他们迎难而上、真抓实干、敢做善成的担当精神与责任意识。小说的语言极具桂西北叙事的特征,比如“颠仔”“野仔”等称呼,“补粮”“做道”等民俗,都是独具桂西北地域特色的文化基因,这样“野气横生”的语言往往带有诙谐、调侃的韵味,再加上小说中不时会融入一些风趣辛辣的小段子,读来让人忍俊不禁。小说最后,从四面八方方向村部聚拢而来的乡亲们,让即将离去扶贫干部们恍然大悟,乡亲们之所以拒绝在验收表格上签字,是因为他们难以割舍与扶贫干部们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份深厚情谊,他们对扶贫干部们的信任与拥戴,在恋恋不舍中得以真情流露。

如果说红日的长篇小说《驻村笔记》是从驻村第一书记的视角展开的话,大化籍作家班源泽的《阳光起舞》(作家出版社,2019年3月出

版)则是从返乡大学生村官阳光的视角展开。同样是扶贫攻坚题材的长篇小说,前者是一个外来的“他者”视角,而后者则是本土的“自我”视角。大学生阳光有太多理由不留在村子里面,他有能力去深圳这样的大城市赚更多的钱,只要他走出山门,外面的世界就会向他敞开心扉;更何况他的城里女朋友光艳艳和他回村住不到两天就因为忍受不了乡村的恶劣环境而独自离开,他完全可以尾追而去。但是作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当乡亲们需要他留下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时候,他选择了留下来。在桂西北的文化场中,感恩精神是最为亮丽的底色之一。尽管桂西北作家们大都在封闭贫瘠的自然环境中成长,但是他们并没有抱怨桂西北故土的野性荒蛮,没有如弃敝屣一般地把故乡的山水及亲人抛之脑后。班源泽笔下的大学生阳光之所以愿意返乡当村官,完全是因为对故土的赤子之心、热血之情、挚爱之意。他耗尽全力,引导群众修公路、办养牛场、建编织品加工厂,让村民们走上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康庄大道。小说中所表现的各种民俗、生产生活等内容,带有浓郁的桂西北色彩。比如山歌文化和铜鼓文化作为小说的主要文化背景,贯穿始终,小说人物阳光、光彩、阳大甘、光云絮等不仅生活于山险、林密的桂西北物理空间之中,还生活于歌的海洋、鼓世界的精神空间之中。在乡亲们歌声与鼓声中,扶贫工作中最重要的“扶志”和“扶智”两大任务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村民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整个村子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也增强了。

关于“扶志”和“扶智”,同样到贫困村当第一书记的都安籍作家李约热在他的短篇小说集《人间消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的第一篇《村庄·绍永和我》中,有着更为深入的刻画。作为第一书记的“我”初到村里,本想大展身手,可是在沉寂、滞重、没有生气的村庄氛围面前,“我”所有的努力都陷于徒劳,就连如何开导因深陷传销回乡变得沉默不言的绍永也是束手无策。沉默寡言、多次自戕的绍永其实就是村庄的缩影,要想让他重新变得生机勃勃,只能靠“扶志”和“扶智”。小说的最后,邻居家小孩的意外让“我”顾不上绍永的自尊,直接踢开他的房门让他和“我”一起送三根血淋淋的小孩断指到医院去。这三根断指让绍永从自我封闭之中突然醒来,在前往医院的路上,他不断重复着:我们还能快点吗?这一刻,绍永完成了向死而生的涅槃,而“我”能够把绍永唤醒,意味着“我”的驻村扶贫工作将走上正轨。

在当下如火如荼的扶贫攻坚战场上,桂西北作家们一直没有缺席,他们通过自身体验,努力“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给当代文坛贡献了一个个优秀的扶贫题材文本。相信在将来的日子里,桂西北作家们会继续与时代同呼吸,创作出更多的反映精准扶贫成功经验和先进典型的精品力作。